

中国妇女研究会



会议简报

2012年第1期

总第10期

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 编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2012年5月20日

编者按：2012年4月28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人口·性别·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妇女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出席会议。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甄砚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福建江夏学院、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河北省妇联等14个部门的40余名相关部委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谭琳、中国人民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福建江夏学院副校长、教授叶文振分别主持了开幕式及四个专题的研讨。会议采取专题发言和圆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期会议简报刊登此次会议主要成果，以供参考。

“第三届中国人口·性别·发展论坛”简介

2012年4月28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主办了“第三届中国人口·性别·发展论坛”。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妇女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出席会议，并在会议最后作了即席讲话。珮云同志指出，根据最近的两个重大调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来分析中国人口、性别与发展的形势，特别是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很有意义。人口学、妇女学、社会学、统计学都是密切相关的学科，举办“人口、性别、发展论坛”，把大家聚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学术研究探讨，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和做法，现在已经办了三届，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她还指出，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希望同志们抓住这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前瞻性的问题，踏踏实实地进行深入研究，来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珮云同志强调，要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法规，发挥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甄砚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福建江夏学院、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河北省妇联等14个部门

的 40 余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与了会议研讨。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谭琳、中国人民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福建江夏学院副校长、教授叶文振分别主持了开幕式及四个专题的研讨。会议采取专题发言和圆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1 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大会上做了专题发言。大家围绕当前人口、性别领域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展开研讨，会议提问和讨论十分热烈。现将会议简况整理如下：

【开幕致辞】

在论坛开幕式上，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甄砚向大会致辞。

甄砚在致辞时谈到，人口是影响到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的发展战略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此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要部署，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指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是新时期人口发展的重要任务。全国妇联高度重视人口与发展工作。她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好两次调查的最新数据，深入挖掘和认真分析数据背后蕴藏的深层次问题，期待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认真总结我国人口、性别领域的实践经验，客观分析当前我国人口、性别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科学把握我国人口发展和妇女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决策提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观点回放】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于去年发布，与会者围绕这两次调查已经发布的最新数据，深入分析了新世纪第一个10年我国的人口、性别与发展状况，对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老龄化的女性化趋势问题、出生性别比问题、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女性退休年龄问题、农村妇女的迁移流动问题、教育的性别差异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10年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发展状况

性别研究领域的专家和来自妇联系统的实践工作部门的同志，围绕今年刚刚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探讨了目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发展状况。作为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在本次论坛上作了专题发言，她从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九个维度，报告了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全国范围的主要数据。她谈到，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的这10年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既取得了进步，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进步主要表现在：妇女健康及保健状况明显改善；女性受教育结构明显改善，男女两性受教育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比重提高，城镇单位女性社会保障状况明显改善，性别差距缩小；女性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女性决定个人事务的自主性提高，两性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上更为平等，男女共同分担家务的观念得到更多认同，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缩小。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西部农村妇女的教育和健康状况有待改善；男女劳动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乡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入分别

为男性的 67.3%和 56.0%；妇女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比例仍然较低，担任各级负责人的比例为 2.2%，仅为男性相应比例的一半；在家庭主要财产如存款、房产、机动车拥有方面，女性均低于男性，其中，女性有房产（含夫妻联名）的占 37.9%，男性为 67.1%；农村妇女失地和土地收益问题突出，失地比例比 10 年前增加 11.8 个百分点，达 21%，高于男性的 9.1%；与丈夫相比，妻子承担家务劳动的负担较重，平衡工作和家庭存在困难；家庭暴力、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现象不容忽视；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亟待改善。蒋永萍主任还指出，本次调查获得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今后将进一步扩大调查数据分析的专家队伍，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并努力促进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

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报告了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河北省的主要数据。她指出，与 2000 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相比，河北省妇女的健康状况、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受教育程度、经济参与能力以及主体意识日趋增强；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提高；家庭事务决策趋于平等；政治参与意识和主动性逐渐增强；男女共同分担家务的理念逐渐得到认同。但是，仍然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妇女的全面健康体检和妇科检查的比例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分别只占 33%和 47.7%；“两癌”（即乳腺癌、子宫癌）筛查的对象也多是生育期妇女，老年妇女因得不到及时检查而身患“两癌”去世的现象时有发生；女性劳动收入偏低问题突出；土地权益的性别差距明显；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小、层次低；家务劳动负担较重，影响到妇女的社会参与和发展。

二、关于 10 年来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

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处处长崔红艳作了题为“2010 年人口普查：

主要做法和特点”的专题发言，对“六普”遇到的困难、主要做法以及特点进行了介绍。她指出，“六普”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寻找普查对象难度大、取得真实数据难度大、普查员选调难度大。为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开展了法律建设、以通知形式下发的有关政策、科学制定普查方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处理、强化户口整顿和行政资料整理等。“六普”主要的变化是将以往普查常住地的登记原则，改变为现有人口加户籍外出的原则，普查项目相应进行了调整。此外，她还对2010年各国人口普查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并对学者使用“六普”数据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说明。与会者围绕数据的使用问题，与崔红艳处长进行了交流，建议国家统计局建立和完善分性别的统计制度，并呼吁统计数据的制度性提供，希望研究工作能够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崔处长表示，国家统计局会进一步开放“六普”数据，通过多种渠道为研究者服务。

与会的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已经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及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探讨了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从人口增长水平、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教育水平、人口性别构成、城市化水平、家庭规模变化六个方面，对新世纪第一个10年人口数据变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人口数据变化的特点之一是惯性增长下的人口规模平缓增长，虽然从总量上看人口规模在增长，但人口增速的势能则明显下降，与前几次普查相比，我们可以从“六普”数据中发现近10年人口增长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特点之二是人口年龄构成变化呈现出少子化明显加快、老龄化加速的态势；尽管目前中国仍然处于丰厚的人口红利期，但其已经开始步入下行通道；省际老龄化的特点发生明显的逆转，区域应

对老龄化难度加大；“流动人口”对于各地区及其城乡人口老龄化形势有着重要影响。过去谈老龄化时，都是针对户籍人口，上海老龄化速度最快。但如果按常住人口，上海尽管仍是老龄型社会，但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重庆，重庆农村人口占了 50%，劳动力外流较多。特点之三是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但人口健康素质问题不容回避。特点之四是总体人口性别比变化平稳，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高位徘徊。特点之五是名义上城市化水平推进加快，但是伪城市化引发的问题亟待关注。“六普”数据显示，城市化水平增长较快，去年已经超过 50%，但个人认为存在伪城市化的问题，因此目前离真正意义的内涵城市化还有很大距离。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和待遇得不到认可和保障，这不叫真正意义的城市化。特点之六是家庭人口规模锐减。区域平均家庭规模下降的趋势并非“一花独放”，虽然有些地区生育率高，但家庭规模在缩小。这从一个侧面暗含着总和生育率下降非常快，由此引发的家庭养老、婚姻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陆教授指出，新世纪的 10 年人口变化不仅更加复杂，而且变化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强调的数量问题，还有流动迁移、性别比、人口素质及分布、家庭、老龄化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对“五普”到“六普”中国人口变化的准确判断事关未来中国人口变化的走向和轨迹，短期来说事关小康社会的实现，长期来说事关中华民族的发展。人口变化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一味等到全面认识其周期性、规律性再做政策调整则可能错过最佳时机。所以，不能只看到人口规模在上涨，还要看到规模后面结构的变化。任何人口公共政策的影响，都有明显的滞后性，而且其影响都是很长远的，我们需要在坐享当前利益和透支未来利益上做出明智的选择。现在我们享受到的是

抚养比轻对 GDP 的贡献,但如果现在不调整政策,则可能要透支未来,透支未来比坐享当前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

顾宝昌教授从性别视角对“六普”公报进行了解读和分析。顾教授认为,从公报数据可以看出 10 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人口增长放慢了、人口老化加快了、出生性别比依然偏高。从年均人口增长率看,已经公布的“六普”公报表明,过去 10 年内年均人口增长率是 0.57%,比前 10 年降低了 0.5%,虽然数据看起来很小,但在 10 年前是 1%,降低了 0.5%就等于降低了一半。如果将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联系起来看,从 1982 年的普查到现在的 30 年里,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直接下降的,现在已经降到了 0.57%,基本上走向了零增长。从年龄结构看,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儿人口比例从 36.2%降低到 16.6%,降低了一半;60 岁及以上的人口从 7.32%增长到 13.26%。2009 年,我们庆祝建国 60 周年,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进入老年人群的都是解放后出生的人,随着大量人口进入老年人群,整个社会正在快速老化。顾教授指出,中位年龄很能说明一个社会的整体老化程度。现在我国的中位年龄是近 35 岁,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 45 岁,有人认为会接近 50 岁,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近有一半人口都在 50 岁以上。这不是老年人增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变老的问题。他还谈到,从性别视角来看,当前应该关注低生育率下的女性生殖健康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问题、出生性别比的新动向问题。此外,他还呼吁学界应加强对人口老龄化与妇女地位的关系、一孩出生性别比出现偏高的趋势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关于农村妇女的迁移流动

关于农村妇女的迁移流动问题,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中国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受流动影响的妇女专卷进行了初步数据分析。她从经济参与、政治和社会参与、社会保障、健康行为、流动经历、主观感受与未来打算、存在问题等方面考察了受流动影响的妇女（包括流动妇女、有流动经历返乡的妇女和留守妇女）的现状；并从资源与机会、个人竞争力、决策与选择等方面考察了迁移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该研究发现：从农村到城市中工作的妇女反映了外出打工的收获和积极影响，很多人希望在城市中继续发展；与其他妇女群体相比，返乡妇女对目前工作发展前途的满意度最低，同时，39岁以下的返乡妇女“有时/经常为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会”的比例最高；流动妇女在城市中仍然遇到诸多问题，如缺乏社会保障和对流入地政治社会活动的参与。郑教授认为，迁移流动为妇女创造了发展机会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关注帮助她们获取/把握这些机会、较好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并使发展的机会不随年龄增长而减少、不因婚姻家庭的需求而被放弃；需要有系统并具有针对性的引导、帮扶和保障措施，提供和创造更多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机会，将迁移的风险和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真正实现迁移流动和妇女发展的相互促进。

谭琳所长在发言中指出，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考虑到了城市化进程对妇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指对流动妇女的影响，还有对留守妇女的影响。她提出，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一是有流动经历的返乡妇女的发展问题；二是由流动妇女生殖健康保障缺失引发的制度完善和落实的问题；三是农村的妇联工作、人口发展工作如何有效开展的问题。调查数据发现，返乡妇女多为已婚人口，她们多数是为了照顾孩子、照顾老人、照顾家庭而返回，对目前工作

发展前途的满意度最低，这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现在农村妇女不是铁板一块了，有流出经历的妇女，她们见了世面，有发展的愿望，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不得不很无奈地回去，如何为这部分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她们回到农村也能够发挥作用，这对农村的妇联工作和农村的人口发展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调查数据显示，与其他妇女人群比，流动妇女现在享有的医疗保障程度最差，妇联工作、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卫生医疗保健工作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她认为，除了制度本身需要完善外，还有如何落实现有政策和制度的问题。比如现在的“两癌”筛查，全国妇联、卫生部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做了很多工作，许多城市妇女和农村妇女都受益了，但是流动着的妇女，由于组织她们存在困难等等原因，她们的健康体检得不到保证，如何面向她们开展工作非常迫切，也非常重要。

有参会者从婚配的角度，提出返乡妇女有利于解决农村地区“剩男”的问题。对此，一些参会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仅仅是从数量上的一个判断，从婚姻匹配来讲，返乡妇女跟农村的“剩男”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与留守妇女相比，有流出经历的妇女受教育程度较高，她们接受过城市的熏陶，见识更广，而那些留守的“剩男”即所谓的“光棍”受教育程度等层次更低，无论从心理上、情感上，返乡妇女和他们往往都是不匹配的。返乡妇女的生活状况、心理状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民间公益组织应该给予应有的关注。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问题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与会专家对“六普”数据和以往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比较一致的观点，即中国社会

正在快速地老龄化。陆杰华教授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对比，并指出，许多人看“六普”数据，非常关注老龄化，其实孩子的减少是更明显的，而且会影响到“七普”、“八普”的数据。从历次普查数据看，0-14岁的人口是下降最快的，“六普”的少儿比例是16.6%，而过去“一普”、“二普”、“三普”这一比例都在33%以上，“四普”是27.69%，“五普”是22.89%，少儿比例下降这么快的原因与生育率下降密切相关。少儿比例低于30%就属于老年型社会，而我们现在是16.6%，已经是非常老年型了，而且预示着将来会更老。顾宝昌教授从性别的视角审视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提出了要重视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趋势，关注老年家庭照料对中青年女性发展的影响。

谭琳所长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对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了专题发言。她指出，我国未来40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将呈现女性化趋势，这里的“女性化趋势”包括两层涵义：一是老年人口结构上反映出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二是老年社会问题中反映出的女性化趋势，比如在诸多老年社会问题（如经济保障、健康保障、生活照料及社会参与等）中，老年妇女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弱势老年妇女群体上，即农村老年妇女、高龄老年妇女和丧偶老年妇女，因此，应当优先关注这三个弱势老年妇女群体。同时指出，低龄老年妇女是家庭照料的重要力量，通过对老年妇女从事家庭照料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进行估算后发现，她们承担的家务和照料劳动所产生市场价值总量每年约为8550亿元左右，相当于当年我国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7.8%，谭琳所长呼吁老年妇女的贡献应从公共政策中得到重视。另外，她还从性别视角提出了基于妇女现实性需要的现实性政策建议和基于妇女战略性需要的战略性政策建议，倡导应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策略。

五、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是本次论坛讨论的又一热点。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作了题为“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专题发言。他指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切实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是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的六项重点任务之一。他简要介绍了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的走势，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为应对这一问题而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的历程，他强调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需要综合治理，要从国家战略、机构职责、法规政策、家庭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应对。

顾宝昌教授认为，在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并不从来就是一个问题。我国在 50、60、70 年代出生性别比一直是比较正常的，但不等于当时没有重男轻女的问题；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调越来越严重，不等于改革开放后我国重男轻女越来越恶化了。出生性别比近几年有所下降，但究竟是趋势性的还是波动性的，现在还很难下结论。本来出生性别比高就是一个歧视妇女的问题，一些女婴因为她的性别不能出生，而许多人关心出生性别比问题主要是出于对男人可能找不到老婆的担心，这就透露出以男子利益为中心的倾向。原来出生性别比有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不正常。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一孩性别比越来越不正常，这说明人们生一孩时就在选择，不要多的孩子，就要一个孩子，但是要一个男孩。越南、台湾的调查数据反映了这一现象。从我国 2005 年的小普查可以看到，有不少省份包括东中西地区一孩的出生性别比高于 110，如北京为 115.53，陕西为 117.33。现在，中央提出到“十二五”规划末期要降到

115,可现在北京等地一孩的出生性别比都到115了,这是个什么问题?现在缺乏研究。

陆杰华教授认为,我国总体人口性别比变化平稳,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高位徘徊。国家提出到“十二五”规划末期出生人口性别比要降到115,虽然近几年统计数据显示出出生性别比有下降,但我们不能太乐观,因为这种下降可能是在波动中的变化,也可能是虚假的变化。出生性别比一路攀升,“六普”是117.94,这一攀升趋势现在在全国蔓延,并从多胎向头胎蔓延。打击“两非”,治的还是“标”,不是治“本”之策。性别比偏高和生育率有没有关系呢?大家看生育率在下降,出生性别比在升高,过去都说是重男轻女,重男轻女是两千年的文化,为什么过去不高,是不是和政策有一定关系?这需要大家思考。

刘爽教授对湖北省宜昌市出生性别比正常的探索与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她认为,宜昌市出生性别比多年保持相对平稳、基本正常的核心实践是始终抓住转变群众生育观念、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这一“治本”之道,倡导婚育文明,推动婚居模式多样化;倡导村民依法自治,促进社会性别平等;适应人口文化转型,改变政府工作模式;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之道。她指出,出生性别比失常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及技术动因,需要从行为(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在治理力度上,现在最为薄弱的是制度层面的行动。制度建设是“治本”之路,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已到了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攻坚阶段。

叶文振教授指出,在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工作机构的设置、工作方案的制定、政策的提出等方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力度还不够,要把对女性的关爱贯穿到整个生命周期,建议将“关爱女

孩”的行动扩展成为“关爱女性”的行动。

六、关于女性的生殖健康问题

顾宝昌教授从性别的视角审视了低生育率时代对妇女的生殖健康将会产生的影响。他指出，低生育率下的生殖健康有四个特点：婚前期在拉长；生育期在缩短；避孕期在拉长；老年期在延长。这一方面涉及到人流模式在发生变化，随着婚前期拉长，未婚人流在增多，许多调查显示，虽然户籍人口的人流在下降，但流动人口中未婚人群的人流在上升；随着避孕期拉长，已婚妇女中避孕失败在增多，由避孕失败而人流的人越来越多，各种调查包括计生委科技司的调查也反映出 2/3 已婚人流由于避孕失败造成的。避孕期长，容易出现问題。但这里到底是器具问题、服务问题、还是使用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生育率走向低水平，生育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剖腹产在增多；母乳喂养在减少；乳腺癌在增多；宫颈癌在增多。世界卫生组织组织实施的“亚洲各国剖腹产调查：2007-2008”数据显示，亚洲各国剖腹产都在增多，但是中国增长得最快。剖腹产从任何角度讲都劣于自然分娩，剖腹产增多不是一个好现象。叶文振教授谈到，低生育率下的生殖健康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要，一些人少生，甚至不生，这些问题不能低估。

谭琳所长指出，人们关注生殖健康往往只考虑农村妇女、流动妇女，其实城市的一般妇女、职业妇女都有生殖健康方面的困惑。有人在争论，职业妇女是“生”还是“升”？是“升职”还是“生孩子”？看起来是妇女没有能力平衡好工作与家庭、生育与工作，如果只要求妇女个人来平衡这两件事情，那么这个社会把太多的生育成本加在了妇女个人身上，不管是机会成本，还是健康成本。这里更重要的问题

是应该推动性别平等。全社会的男性、女性，家庭中的夫妻要一起来平衡，国家的公共政策要支持这种平衡。如果按现在的托幼服务水平，对城市职业妇女放开政策让她生都很难生，生育与职业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对妇女的职业发展有战略性的不利影响。有这种感受的人，不会认为是生男生女都一样，因为对她的职业发展太不一样了。这是性别研究、人口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俞华谈到了妇女的心理健康健康，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支持体系问题。她认为，在向性别平等迈进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妇女个体的承受力，不可过快、过猛，当提出一个目标或开展一项活动时，一定要建立相应的社会支持体系，否则妇女可能会加倍地承受很多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比如“两癌”筛查，卫生部、妇联都在做，人口计生委也在积极参与，推动筛查工作，但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如果贫困妇女筛出病了，又没有相应的救助措施，这会给妇女和她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七、关于退休年龄、教育的性别差异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童玉芬，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队列推移的方法，对提高妇女退休年龄情况下新增劳动力的规模和变动进行了估计，量化分析了女性退休年龄延后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妇女退休年龄对就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采用小步渐进的方式，可以将影响大大降低，不会对劳动力市场就业产生大的压力影响。童教授认为，提高退休年龄并不是强制晚退休，而是给妇女一个基本的平等就业选择权，实际上很多妇女可以自由选择继续就业还是不就业，研究计算的结果仅仅是理论上的最大值，实际的新增劳动力规模要小于估计值。

这将使可能的就业压力比理论估计值要小。此外，中国将很快迎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无限劳动力供给将转向有限供给甚至短缺，相对于未来每年 1500 万的新增岗位，提高妇女退休年龄将会弥补未来城镇劳动力的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利用“六普”数据和以前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近 30 年教育的性别差异的变动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从 15 岁及以上文盲率、6 岁及以上受教育年限、20 岁及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三个指标看，教育的性别差异随时间而大大缩小，低龄组教育的性别差异基本消失。同时发现，由于女性累积劣势积淀而形成的年龄差异、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地区差异、城乡之间的不平衡而造成的城乡差异的存在，教育的性别差异并没有消失。

八、关于完善公共政策问题

与会者对学界如何有效深入地开展应用研究、促进公共政策的完善方面，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甄砚副主席在讨论中谈到，希望专家学者进一步开发调查数据，把当前的研究再向前深入一步，力求准确地反映当前人口、性别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操作化的政策建议提请相关部门重视，以发挥研究服务决策的作用。与会的专家学者也一致认为，学界需要在推动问题解决的路径研究方面做深做细，为国家出台相应的公共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刘爽教授谈到，现在女性已经分化成各种各样的群体，研究需要关注不同的群体，特殊人群背后往往是有政策含义的。比如，家庭妇女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考虑不到这群人，她们只能依附丈夫、子女、家庭。我们的研究应该关注这一人群，

把她们的声音传递上去。如果能推动这方面家庭政策出台的话，她们将是直接的受益者。

关于完善家庭政策方面，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帆谈到，我们国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政策，或者说家庭政策的层次很低。比如平衡工作与家庭，我们基本上是个人的作为。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平衡工作与家庭，工作家庭平衡支持计划都是一个政府层面的作为，比如在日本，如果家庭有未成年的儿童和老人需要照顾，国家就会对家庭照顾者提供许多支持性的帮助，包括特殊的休假制度、退税和免税的政策等。

陆杰华教授在谈到如何应对老龄化方面，提出了公共资源应该向中西部倾斜，向农村地区倾斜，向老年女性倾斜。现在老龄化最严重的不是在大城市、发达地区，老龄化加剧程度最严重的是中部、西部，是农村地区。现在应对老龄化，发达地区相对做得比较好，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做得比较差，其实关键的重点是在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应对老龄化问题，不应该是把所有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城市，更应该关注中西部，关注老龄女性。

此外，与会者还就如何更科学、更合理地传递性别平等的理念、加强人口研究、性别研究的交流展开了研讨。与会者认为，加强对高层领导干部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倡导非常重要，高层决策者具有性别平等的敏感性，将有助于在制定公共政策中纳入社会性别的视角。与会者还一致呼吁，更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尤其是男性学者加入到性别研究的队伍中来，从更中性、更客观的角度来研究性别问题。

“人口·性别·发展”论坛是为促进人口研究和性别研究的沟通合作而搭建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第一届论坛于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

学妇女研究中心在北京主办，第二届论坛于2010年由福建江夏学院在福州主办，本次为第三届。论坛受到了从事人口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学者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欢迎和重视。与会者认为，人口研究、性别研究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沟通交流平台上，既有人口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对话，又有政府部门领导和研究者的对话，还有高层领导和基层工作者的对话，大家都受益匪浅，并殷切希望这个良好的平台能够持续举办下去。谭琳所长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研究基地是教育部的人口学重点研究基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开展性别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所，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促进人口、性别问题作为发展问题不断取得新的理论进展，同时我们也特别欢迎更多单位主动积极地承办这个论坛，我们特别愿意和更多单位一起把这个论坛办好，让这个论坛在各个部门、各个地区转起来，不断地让大家听到新鲜的经验，收获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现在又有了新的契机，“六普”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刚刚开始开发，明年举办论坛会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希望有关部门和我们一起共同推动人口、性别研究的繁荣发展。

【领导总结】

会议最后彭珮云同志做了即席讲话。珮云同志谈到，因为长期从事人口、性别与发展方面的工作，对这些方面有一种情结，一直关注人口、性别与发展问题。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感觉内容非常丰富，受到了很大启发、收获很大。她指出，根据最近的两个重大调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来分析中国人口、性别与发展的形势，特别是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很有意义。会议讨论中涉及到

的教育问题、老年问题、出生性别比问题、女性退休年龄问题、农村妇女的迁移流动问题等等，都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同志们确实是做了认真的研究。

珮云同志指出，人口学、妇女学、社会学、统计学都是密切相关的学科，举办“人口、性别、发展论坛”，把大家聚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学术研究探讨，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和做法，现在已经办了三届，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她还指出，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希望同志们抓住这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前瞻性的问题，踏踏实实地进行深入研究，来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珮云同志强调，要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法规，发挥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她指出，很高兴这次论坛有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统计局的司处级干部来参会。认为，研讨会的主角仅仅是大学的、研究部门的、社会团体的还不够，还需要与政府部门的领导进行沟通，高层倡导确实还是不够的，这方面还特别需要加强。她非常希望在这方面政府能够做得更好。学者和政府部门要很好地开发利用这两个调查，认真分析形势、研究问题，不发现问题更谈不上去解决问题了。此外，进一步推进我们国家的性别平等还需要做很多的宣传倡导工作，包括对决策者的宣传倡导，而这些调查材料就是很好的依据，把问题讲清楚了，决策者就会对诸如为什么我们要把男女平等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等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

珮云同志非常关注基层的好经验。她以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个问题为例，指出，国家采取了许多治理措施，近几年比例有所下降，但是这种下降究竟是趋势性的？还是波动性的？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国家

人口“十二五”规划定下了五年要降到 115 的目标，她认为打击“两非”可以起一定作用，但根本问题是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听了专家介绍湖北宜昌、河北等地的经验和做法，珮云同志非常高兴。她指出，很多问题好像在上面看起来是非常难以解决的，而有些地方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多创造性的突破，这说明中国不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她希望大家认真地总结、宣传、推广这些好经验，并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推动中国人口、性别事业的发展。

报：陈至立同志、彭珮云同志

送：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发：全国妇联机关各部门、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负责人、妇女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妇女研究所全体同志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2012 年 5 月 20 日印发

(共印 250 份)